

ZHONGGUO YUYANXUE

中國語言學

第七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

第七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 第7辑 / 郭锡良, 鲁国尧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301-24185-1

I. 中… II. ①郭…②鲁… III. 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①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1390 号



书 名: 中国语言学 第七辑

著作责任者: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85-1/H · 35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4印张 380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国语言学》工作委员会

主 编：郭锡良(北京大学)、鲁国尧(南京大学)

学术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陈章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侯精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胡壮麟(北京大学)
江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李维琦(湖南师范大学)
陆俭明(北京大学)
钱曾怡(山东大学)
孙良明(山东师范大学)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
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
薛凤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詹伯慧(暨南大学)
宗福邦(武汉大学)

陈新雄(台湾师范大学)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
吉常宏(山东大学)
蒋绍愚(北京大学)
李行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宁继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裘锡圭(复旦大学)
唐作藩(北京大学)
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
徐思益(新疆大学)
许威汉(上海师范大学)
曾宪通(中山大学)
赵振铎(四川大学)

编辑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
黄德宽(安徽大学)
蒋冀骋(湖南师范大学)
李家浩(北京大学)
李小凡(北京大学)
刘晓南(复旦大学)
马重奇(福建师范大学)
乔全生(山西大学)
宋绍年(北京大学)
孙玉文(北京大学)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
王韶松(山东出版集团)
杨端志(山东大学)
殷国光(中国人民大学)
喻遂生(西南大学)
张 猛(北京语言大学)
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董 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郭芹纳(陕西师范大学)
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
李国英(北京师范大学)
李建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
卢烈红(武汉大学)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
邵永海(北京大学)
孙建元(广西师范大学)
唐钰明(中山大学)
汪维辉(浙江大学)
吴金华(复旦大学)
杨亦鸣(徐州师范大学)
俞理明(四川大学)
曾晓渝(南开大学)
张涌泉(浙江大学)

编辑部主任：孙玉文

目 录

张民权	论汉藏同源词的历史比较与汉语古音构拟问题	(1)
张卫东	论与南京话、明代官话历史相关的几个问题	(14)
刘子瑜	刘宋川 唐诗一字平去两读而义别问题简析	(19)
徐从权	脂微分部问题研究	(34)
	——兼论古韵再分类	
李维琦	读《道行般若经校注》数则	(54)
杨逢彬	《论语》词语考释六则	(60)
俞理明	顾满林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的社团分布分析	(66)
史有为	试说汉语语篇的连贯与接应	(74)
董志翘	略论“中”的语法意义与语法功能	(95)
宋亚云	上古汉语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划分的百年回顾	(106)
	——兼论上古汉语动词三分体系	
张振兴	王力先生与汉语方言研究	(130)
项梦冰	汉语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类型的地理分布	(136)
	——分区角度的考察	
陈宝贤	福建漳平溪南方言数字串的连调组划分	(170)
关辛秋	汉语虚字研究成果对清代满语语法研究的影响	(184)
田小琳	李 斐 马毛朋 关于辞书修订与创新的几点认识	(192)
	——兼谈香港三联书店《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繁体字本)出版工作设想	
【笔谈】		
王 宁	在2012年暑期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开班典礼上的讲话(2012年8月15日)	(201)
济 宽	关于“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	(204)
【转载】		
姚振武	科学精神是什么?	(211)
[美] 托尔斯滕·帕特贝格	中国应向世界推广中文词汇	(215)

论汉藏同源词的历史比较与汉语古音构拟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张民权

摘 要 同源词的比较构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然而有些学者的研究却过于随意,问题很多。主要表现为缺乏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或缺乏历史知识,用后起的亲属语言词汇进行比较;或缺乏汉语史知识,所用来比较的汉语词义不是它原初的意义,而是后起的引申义;或考释不精,在古音构拟上存在严重缺陷,缺乏明确的历史层次和时空定位,诸如二等韵及其r介音说、喉音影母及齿音精组拟音等,均有悖于汉语史实。本文以一些学者的研究为例,就同源词的历史比较与汉语上古音系构拟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辩证其是非;强调汉语古音构拟必须从汉语史实出发,脱离汉语实际,一味地迁就亲属语言的音系特点去进行所谓的比较构拟,都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 比较原则 词义匹配 音系构拟 汉语史实

汉藏亲属语言的论证,最为关键的是同源词的比较,然而从目前研究状况看,问题很多。一些研究者并没有完全遵循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在亲属语言还未能得到确证的情况下,从自己虚拟的古音出发,随意地找几个语音相似的词比附在一起,就以为是“同源词”,缺乏历史事实和语言事实的说服力。其构拟的汉语上古音系也就存在着严重问题,既不符合汉语特点,又与亲属语言相悖,貌似比较,实为杂凑。本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提出某些观点或假设论证也未免不可,而探索之中,难免会产生某些偏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事情。但近年来,有些人却把谬误当成真理,以非我莫属之架势排斥一切:不类我者非“主流”也。这种非正常的学术生态环境不能不引起学界的忧虑,很多学者纷纷撰文讨论,前辈学者中郭锡良先生、鲁国尧先生、王宁先生等,中青年学者中孙玉文先生、黄易青先生等都有专文发表。¹ 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廓清迷雾和拨乱反正起到了强弩硬弓的作用。

学术需要探索,更需要批评,否则,学术研究就不会有进步。只要批评是真诚的,实事求是,能够揭示问题的实质,对今后的研究有帮助,就应该受到欢迎。对中外前贤的研究如果一味地追捧,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矮子看戏,跟在别人后面瞎叫呼,甚或“皇帝的新衣服”,说不得,只会窒息学术的创新与发展。学术要创新发展,需要的是观念更新

* 基金项目:《万光泰音韵学稿本与汉语上古音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10BYY048。

1 一些研究文章集中编排在《音韵学方法论集》一书中,商务印书馆 2009 年出版,有的则散见于其他论著或刊物中,恕不列举。

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更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没有顾炎武那种五十年后必有知我者之信念,学术研究就难以做到后浪推前浪。从宋人古音通转叶音说,到明代陈第古音时地说,再到清代顾炎武离析唐韵,至民国黄侃古韵阴阳入三分,乃至今日音系构拟法,每一次历史进步都是观念更新和研究方法改进的结果。本人潜心研究顾炎武古音学多年,深为其“经学救国”而近似“痴迷”的执着精神所感动,遂斗胆写了这篇文章,揭示谬误,辩证是非,就教于博雅君子。汉语上古音系的比较构拟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其中得失,也需要有个总结思辨的过程,以进一步推进汉语上古音的重建工作。

我也知道,文章一旦发表,将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乃至指责:小子狂妄,不知天高地厚!我也知道,即使我的研究工作百分之百的正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无法改变当今学术生态和学术环境,但我秉持我的信念:我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告知人们这个世界的本来样子是什么。

总结近年来汉藏比较与古音构拟研究,窃以为一个共同的弊端是:

从自己虚拟的音系出发,然后在藏语或其他亲属语言中寻找相应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不是从比较中归纳音系,而是先入为主,以想象中的原始汉藏语音构拟加以推定,循环论证,在这些被寻找出来的“同源词”里,缺乏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比较范围过于宽缓,构拟的音系存在严重缺陷,有悖于汉语史实和语言学的基本原理。

在音系构拟上,迁就亲属语言的音系特点太多,缺乏一个基本的比较原则,貌似比较,实为杂凑。不能正确对待古今语音的变化发展,拘泥于中古等韵四声关系和少数谐声异类,只看到变化的结果,而对演变过程本身缺乏深度考察,很多情况下往往以大胆的想法代替语言事实的分析和考证。

下面,我们不妨以郑张尚芳、包拟古、潘悟云和梅祖麟等中外学者的研究为例,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纯属学术讨论,不关乎学派之争,好事者幸勿引申。本着对真理的追求,对其中谬误进行分析乃至学术批评,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一个有气度的学者我想是会虚心接受的。我们尊重这些学者的研究,并对他们的探索精神表示敬意,但真理与谬误不容混淆。

一 比较的词语必须符合历史事实

按照一般的看法,所谓汉藏语系分化的时间至少是在五六千年以前,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同源词比较时,就必须考虑它们何时同源又何时分化的,以确立我们所研究的汉语上古音的时空关系,在此前提下再考虑原始人类生产、生活状况及其认知水平,诸如村庄、金银、夫婿、妇媳、叔舅等词语都应当谨慎择取,譬如一个民族尚处于母系社会或婚姻宗法制度还不是那么完备,“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赘(嫠)嫂”(《后汉书·西羌传》),一些亲属关系词就应该慎重择取。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远古时代“金银”不可能出现,“叔”“舅”关系在汉族中区分得很清楚,但有些民族部落则不甚区别,至今一些民族部落还是如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东西南北地域和气候差异,因为“华澳”语系覆盖整个东亚南亚大陆。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氏族部落处于农耕社会与处于游牧渔猎社会状态,其词汇是不一样的,因为词汇的产生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的,这是历史语言学的基本常识。

可是,有些研究者常常忽略这些基础性工作,在他们拿来比对的词语或者是核心词汇

里, 往往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词语, 缺乏历史深度的考虑, 殊不可取。

如郑张先生《上古音系》中同源词的例子(郑张 2003):¹

	汉语古音	藏文	缅文	泰文	孟文
巷	*grooŋs	groŋ 村庄、市镇	kroŋh 路	glɔŋ 路道	glɔŋ [kloŋ] 道路
江	*krooŋ	klɔŋ 江河	khjoŋh 河溪	glɔŋ 河港、渠、路	krɔŋ [krəŋ] 河川
谷	*kloog	grog 深谷	khjok 山谷	glɔk 道路	

以上比较材料, 基本上来自包拟古的《上古汉语中具有 l 和 r 介音的证据及相关诸问题》一文。²然而细绎之下, 其中不无问题。

第一个“巷”字, 远古时代, 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藏族先民, 是否有“巷道”“村庄”“市镇”的存在?

以历史文献为例,《大雅·緜》一章:“緜緜瓜瓞, 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古公亶父, 陶复陶穴, 未有家室。”按古公亶父为周文王祖父, 从豳地迁至岐, 时约公元前 12 世纪左右。其时周民族尚“陶复陶穴”(复, 重窑), 更何况游牧之戎狄? 又《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 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作为游牧民族的古藏族居民羌人也应当是如此。《后汉书·西羌传》:“所居无常, 依随水草。地少五谷, 以产牧为业。”又《南齐书》卷五九《河南氏羌》:“多畜, 逐水草, 无城郭, 后稍为宫屋, 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以上材料均可说明游牧民族的居住情况。

退一步说, 即使当时藏族先民中有“村庄”“市镇”的存在, 它与“巷”和“道路”也难以对应, 概念的名称及其内涵、范围都不一样, 两者毫无比较可言。

第二个词语“江”在汉语里特指南方的河流“长江”, 是专名而不是共名, 表示共名的是“水”, 如汉水、湘水之类, 而表中所列藏文等河流名称恐怕是共名还不是专名。

其实, 根据《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词汇表所列, 表示江河的概念词古藏文有 *te^hu*, 并且在 52 个藏缅语调查点中均没有 *klɔŋ* 这样一个音型。³ 第三个词“谷”, 根据白保罗(1984)的研究, 藏缅语表示溪谷的词还有 *khyauk* (缅语)、*kor* (藏语、卢舍依语) 等(见白书页 78、页 35)。⁴

为什么包氏和郑张氏不用藏文的 *te^hu* (江河) 或 *kor* (山谷)? 因为这样就与他虚拟的古音不符。

按照雅洪托夫、包拟古和李方桂等人的看法,《切韵》中的二等韵在上古时代, 其声母后存在一个 -r- 或 -l- 的介音, 实际上就是带流音的复声母 Cr- 或 Cl- (后一律改为 Cr-), “巷”和“江”为二等字, 所以其上古音是 *grooŋs (去声字有 -s 尾) 和 *krooŋ (郑张认为一二等

1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 第 5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2 参见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 第 242—280 页。潘悟云、冯蒸译, 中华书局 1995 年。

3 藏缅语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第 38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4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 乐赛月、罗美珍译,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 年。

韵是长元音,故重写为oo)。尔后郑张等又进一步认为,重组三等韵以及庚、蒸、幽三韵中牙喉唇音字也有一个带流音的r,而一四等韵以及重组四等韵则有一个带l的后置辅音。

“谷”属于一等韵,故其古音为*kloog。其理论基础就是雅氏提出的来母字经常与中古二等韵的字发生谐声或异读关系,如果这个理论不能成立,其音系构拟就将面临着崩溃。

经过验证,我们认为,雅氏之说非常错误,一是辅音与介音不分,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r-、-l-作介音的,藏语中-r-也是后置辅音,如经常用作二等字比较证明的两个词:brgyad(八)、brgya(百),-r-居于两个辅音之间,很难说明其介音性质。其辅音性质完全可以在藏汉对音中得到印证,如《唐蕃会盟碑》:藏文 khri,汉译“绮立”;藏文 bran,汉译“勃阑”;藏文 klu,汉译“矩立”,¹如果是介音就无需将它译写,这是一个基本的对音原理。其次是与汉语史实不符,因为来母字不仅与二等字发生谐声关系,也与一等和三四等韵发生关系,而且在谐声数量分布上,二等字并不占优势。²如果二等韵有个卷舌的r介音,再加上来母字与一、三、四等韵都发生谐声关系,那就意味着整个汉语语音体系都是Cr-或Cl-的音型,可能吗?无论把它看作是介音还是辅音都是一个漏洞百出的语音体系。

譬如从谐声上看,如果上古音有个辅音性质的r卷舌介音,它们如何谐声?如“瓜”*kwrag与“孤呱”*kwag,“乍”*dzragh与“作”*tsak(以上李方桂鱼部字拟音),语音如此参差,它们怎么能够能为一组谐声系列?除非我们认为“孤呱”也是复声母*kl-,就像郑张等所认为的一四等韵也有带-l-的后垫辅音。但这样麻烦又来了,因为既然认定来母为r-,喻四为l-,而“瓜”字并不与来母或喻母字发生谐声关系,且有违“情理”。如《大雅·生民》诗“后稷呱矣”,后稷一生下来就被母亲姜嫄抛弃了,呱呱而哭,如果“呱”音为*kwlag的话,一个婴儿怎么能发出如此复杂的声音来?且哭声很长:“实覃实吁,厥声载路。”一个语音的音节如果是封闭性的,且有塞辅音韵尾,恐怕很难延长,有违“自然生理”。又《尚书·益稷》:“(禹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呱呱(*kwlag *kwlag)之音如果重叠,语音就非常复杂。婴儿出生时的啼哭之声,恐怕古今一致,语音不会有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复杂。

其他如《诗经》中的“关关雎鸠”,“鸡鸣胶胶”,“黄鸟喈喈”,“仓庚喈喈”、“交交黄

1 参见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第235—24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我们以丁邦新《论上古音带l-的复声母》一文提供的谐声字为依据,统计出来母字为声母的谐声字和非来母字谐声中央带的来母字的数量关系:(1)来母字为其他声母字的声符:一等16,二等20,三等42,四等4;(2)其他声母字为来母字的声符:一等46,二等19,三等69,四等12。两者相加,一等62,二等39,三等111,四等16(以上声首字及重复出现的多音字没有统计在内)。显然,在谐声关系上二等字并不占优势(丁文谐声表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3-54页,中华书局2008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两位博士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一是李建强的博士论文《来母字及相关声母字的上古音研究》(2006),其次是崔彦同学的论文《上古二等r介音构拟小议》(《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他们对来母字谐声关系及其数量模式的归纳,与我们的统计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选取丁先生的谐声字表,而于其构拟的上古音系不敢苟同。窃以为丁先生关于来母谐声系列以及整个汉语上古音的构拟都存在严重问题,例如同样是来母的字,其音系构拟则有:六 bljakw,寮 dljakw,吕 gljakx,丽 dzljigh,让人很难相信汉语音系有如此的破碎和杂乱无章。这里我们不妨以寮声字为例分析其弊病所在。从寮得声八个字,实际上只有寮有异读,卢皓切又张绞切,仅凭一个张绞切的异读就把全部的寮声字拟音为dl-的复辅音声母(寮拟音 tragwx),以个别谐声异读而不惜牺牲整个语音系统。实际上考察唐代韵书,寮字只有一读卢皓切,检阅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所载各种唐韵残卷均是如此,唐《五经文字》及何超《晋书音义》四次注音也是如此。寮之意义有二:(1)夜猎,(2)西南夷族名,但无论哪种意义都是来母,此字音变首见于《龙龕手鑑》和《广韵》。显然,寮读张绞切是后来音变结果,把寮声字的上古音拟为dl-,有失历史考证。从共时平面上静止地观察谐声异读而不作历时考察,几乎是比较构拟和复辅音说的通病。

鸟”“交交桑扈”“鸟鸣嚶嚶”“其泣啍啍”等，这些拟声词都是所谓的二等字，按照李方桂等人的构拟，其声母后都有一个卷舌的 *r*，如“关”*kwran*，“交胶”*kragw*，“嚶”·*ring*（李氏影母字以·表示，郑张拟为 *qrij*），¹“啍”*gwrarj*，这些婴儿啼哭和鸡鸣鸟叫声都是天籁之音，很难想象有如此的复杂。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初生婴儿能发出带卷舌 *r* 的复声母的语词来？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退一步说，如果 *r* 是介音，它必将改变原声母的发音部位而使之变为卷舌性质的声母。根据谐声原则，发音部位不同，它们之间是不能谐声的。高本汉将《切韵》庄组字拟为卷舌声母 (*ts-*)，之所以不为大家接受，²就是因为庄组字与精组字 (*ts-*) 谐声关系最为密切，如阻 *ts-*：祖 *ts-*，乍 *ts-*：作 *ts-*，瘦 *ʃ-*：叟 *s-*，等等，李方桂批评说：“卷舌音与舌尖前音发音部位也不同，不应当谐声。”³。但可惜的是，李氏却全面采用雅洪托夫的观点，坚持二等韵的 *r* 介音说，包括知庄组的三等韵字拟音（如箸 **trjagx*、庄 **tsrjang*），将雅氏错误进一步理论化和体系化，并错误地认为：

这个介音 **r* 不但可以在舌尖音后出现，也可以在任何别的声母后出现，也可以在介音 **j* 的前面出现，不过在唇音及舌根音后这个介音多数已在中古时期失去。（15 页）

此说凭空想象成分太浓，缺乏基本的语言事实依据。实际上，无论是雅氏谐声说还是李氏“声韵结合”说，都不能成立。第一，《切韵》时代并没有产生卷舌声母，*r* 介音说失去了附着的依据；其次，唇音及舌根音后的 *r* 介音在中古时期如何失去？为什么不能产生卷舌作用？并不清楚。前面说过，*r* 不能充当介音，与汉语声韵性质有违。在汉语里，所谓介音——传统音韵学称作韵头的，介于声韵之间，属于韵母部分。这些在韵书的反切下字中看得清清楚楚。对韵母而言，其作用主要有两种，一是使洪音细音化，其次是使开口韵变成合口韵，能承担这两种作用的语音要素的只能是属于元音性质的 *i* 和 *u*（一些学者喜欢用 *j* 和 *w*，但与 *-i-*、*-u-* 仍有区别）。由于韵头属于韵母部分，其位置只能出现元音性质的音素，而作为流音的 *r* 或 *l*，属于辅音性质，不能充当介音的角色，因此，*r* 介音不符合传统音韵学原理，也与汉语事实不符。如果说，汉语中还有一个卷舌介音 *r*，完全是无中生有，一个天外来物。⁴

很多人喜欢搞汉藏比较，可是没有去认真研究藏文的音系结构问题。在藏语复辅音声母中，最常见的有 *-j-*、*-w-*、*-r-*、*-l* 四个后置辅音，“两个半元音 *-w-*、*-j-*，两个流音 *-r-*、*-l-*，构成 *Cw-*、*Cj-*、*Cr-*、*Cl-* 四种形式的复声母。”⁵这是《汉藏语概论》的定性。翻阅研究藏缅

1 这里给李先生出了个难题，影母字是零声母，二等韵若有 *r* 的话，那就不成为零声母了。

2 从汉语语音史考虑，其时还没有产生卷舌音。李方桂用 *r* 介音说来解释中古卷舌音的产生，其实也是高本汉错误的延伸，而且又滑向了另一种更深层次的错误。

3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11 页。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4 从语音系统上看，既然汉语有 *-r-* 介音，那就应该还有 *-l-* 介音，因为 *r* 与 *l* 都具有流音的性质，介音中有 *r* 而无 *l*，结构上残缺。为修补这种理论上的缺陷，现在很多人不把它看成介音，而把 *Cr-*、*Cl-* 音型视为复辅音声母结构，如丁邦新《论上古音带 *l-* 的复声母》和张世禄、杨剑桥《论上古带 *r* 复辅音声母》（《复旦大学学报》1986 年第 5 期）等。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 *r* 介音说。郑张《上古音系》在这方面是前后矛盾的，一方面把 *j*、*w*、*r*、*l* 视为声母的后置辅音，曰：“基本声母后带流音 *r* 或 *l*，是最常见的复声母的基本形式。”（页 50）但在第五章韵母部分又把它作为介音加以叙述和讨论，而其中又无 *l-* 介音的存在。态度颇为骑墙，反映出这个古音构拟体系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杂凑和破碎。

5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第 13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语的著述,鲜有人把流音-r和-l看成是介音,并对介音之说深表怀疑。¹因为在汉藏语的对音中,Cr-和Cl-都是用两个汉字音节对译,如藏文khri,汉译“绮立”,klu译“矩立”(见上文举例)。因此可以判定它们为复辅音结构。苗瑶、侗台语的研究著述也是如此,至少从《汉藏语概论》中还没有看到有关r介音的表述。而郑张举例的藏文groŋ(村庄、市镇),klug(江河)本身就是一个复辅音结构而不是带有r(l)介音的音节问题。

可见,把流音r视为介音,不仅违背汉语事实,也有悖于汉藏比较研究。而且更致命的是,与他们的整个古音体系发生冲突。按照一般比较构拟者的研究,诸如包拟古、白一平、郑张和潘悟云等人的说法,上古音的三等韵中,-i-介音并不存在。既然如此,二等韵的r介音又从何而来?而一、四等的介音-l-,又有存在的必要吗?可见这个体系是非常矛盾的。既然连三等韵的介音都不认可,为什么还要在一二三四等韵中设置一个带流音性质的r或l介音呢?实在令人困惑!一方面,又要取消三等韵-i-介音的存在,一方面又要在一、二、三、四等的各个韵次中,设立带辅音性质的-r(l)-介音系列,我们实在看不出这种音系构拟的高明之处何在?有理乎?有据乎?

事实上,关于二等韵r介音问题,无论是雅洪托夫、李方桂还是郑张尚芳等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汉语史内部证明,那些所谓的证据包括亲属语言的同源词比较,根本就经不起检验,²上面郑张的比较构拟就是例子。尽管雅氏和李方桂先生等都是“大家”权威,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只相信真理而不是权威。

二等韵及其r介音说,是汉藏比较构拟说的一个重要理论,如果这个理论的泡沫一旦被捅破,整个音系构拟就面临着崩溃。

按照我们的看法,上古声韵只有洪细之别,没有四等之分,所有后来四等乃至重组都是语音发生变异的结果。等韵学家对这个新的语音系统进行音系结构分析,以韵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世界上最完备的汉语音系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古音时需要考虑这些等次问题(其中也非语音因素),但在研究上古音时,就要格外小心,如同《广韵》一样,韵图的等次只能作为我们研究上古音系分合的参考,而不可太拘泥于它,否则就有可能掉进等韵的陷阱里出不来。这既是研究观念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人为地为上古音构拟四个等次的语音差别并贴上“等”的标签,所谓二等韵为-r-,一四等韵为-l-,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做法。既然上古声韵与中古声韵之间有如此大的区别,中古音的四个等焉能就是上古的四个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一边以变化的眼光看待“声”“韵”,一边又以静止的眼光看待等韵,犹如跳现代舞,一只脚穿着高跟鞋,一只脚却踩着木屐,我不知道能跳出什么样的舞蹈来。

现在,我们再回到郑张先生同源词的比较上。我们说,同源词的比较应该建立在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上,它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语义上基本吻合一致,符合汉语与藏缅语的历史事实;第二,语音上在求得相似的情况下,还必须能够解释其古今音韵

1 参见孙宏开《原始汉藏语的介音问题》,《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

2 例如潘悟云(2000)提供的汉语史证据:(1)葍*kra~芦*k·ra;(2)蔞*kren~莲*k·ren;(3)漣*kren~漣*k·rens(《说文》漣也)。(页291)例(1)(2)是名物词的异名,例(3)是词语训释,把此等例子看做是来母字与二等韵字发生语音关系的证据,荒谬之极!如荷花莲藕的异名甚多,不独“蔞”“莲”二字,如果把所有名物的异名都看成是复辅音来源的依据,那整个汉语上古音声母系统将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世界。按,“葍蔞漣”为二等字,后三字分别为一等(芦)、四等(莲漣)字,作者拟音毫无道理。

演变规律；第三，这种同源词的语音是否符合汉语与藏语等语言事实；等等。例如按照第一条标准，“巷”字及村落概念在古老的游牧民族不可能存在，失去了比较的意义。按照第二条标准，中古汉语的二等韵是否都是对应着藏语 Cr-的复辅音形式，反过来亦如此，藏语 Cr-音型的词是否都对应着二等韵？实际上反例太多，根本就不能构成对应关系。相关词汇和解说可参见白保罗的阐释（34—43 页）。

二 比较的词语必须在概念指称上保持一致性

这里还有个比较的方法问题。为谨慎起见，我们认为，同源词的比较，在充分考虑上古时代人类生产活动等情况下，应当尽量挑选那些意义单一的名物词进行比较，如天地日月牛羊猪狗鸡鸭之类。因为词汇意义宽泛或意义抽象，其同义关系的词语就会非常多，尤其是那些具有领属关系的词，如上例中的“河流”“山谷”“道路”之类，同义词太多，很容易让人误入歧途。此外，动词和形容词的比较应当格外谨慎，这类词语不仅同义词丰富，还有形态问题，如藏语动词形态变化纷繁复杂，存在时态、语态（自动或使动）和语气（祈使、喜爱）等内部曲折变化，由此带来的前置或后缀辅音的增损与原词的差异。¹尽管比较语言学并没有规定哪一类词语在比较之列，但一个谨慎的研究者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否则，就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而缺乏说服力。

但即使是名词，也要考虑其语义的对应问题，例如在郑张（2005）《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和潘悟云（2005）《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等文章里，²其比较构拟就很有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用侗台语的“鸟”mok 对应汉语的“鸢”*moog，同时藏语的“鸟”bja 对应汉语的“鳧”*ba。“鸟”是通名，而“鸢”“鳧”是专名，两者根本就不能比较。而郑张的比较原则是：“可允许名动名形相转，大小称相转，通名与代表种相转，相似物、相近部位相变转等。”（页 452）如是，凡世界各民族语言的词汇都可以比较通转，同源词的比较渺无涯涘矣！下面是他的举例：

（1）藏文的“血”khrag 对汉语“赤”khljaag，对印尼语的“红”merah；

（2）台语的“汝”muŋ 对汉语的“氓、𡵓”；

（3）藏文 hbri “写、画”跟 ri（图画、花纹）不对汉语的“笔”，而是对“嫠、理”。

这种荒唐的例子可以随手拈来。例（1）“血”跟颜色词搅混，例（2）人与人称代词并列。例（3）嫠是寡妇，竟然可以跟写字、图画纠缠，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下面是包拟古影母字的比较构拟，³汉字后为原书作者拟音。

汉语

藏语等

缁*sgul, *skul

sgul 移动/’ gul 移动、摇动、搅乱、发抖

夭夭*sgryel/*skrjew

gyel/sgyel 倒、跌/颠覆、杀（马）

噫*sgriks,*skriks

sgegs 打嗝

鞞*gwraak, *sgwraak

greg 缚/’ grogs 结伴、缚、扎、系/sgog 缚

以上同源词的比较无论是语音还是语义都难以构成比较对应关系。

首先从语义上看，左边汉语的词基本上是名词或形容词，右边藏语的词都是动词，有

1 参见黄布凡《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

2 这些文章均刊载于王士元编，李葆嘉主译《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年。以下引文同。

3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译本第75页。

时态的变化,且双方词义差别很大。(1)汉语的“缢”是麻桌的意思,《说文》“缚也”,《广韵》文韵“乱麻也”,并无移动之义;(2)“夭”基本意义是“少壮”,《诗经》“桃之夭夭”是也;其次是“弯曲”,《说文》“屈也”。至于“夭亡”之夭,仍是作修饰语用,指少年死亡,后引申出死亡的含义,于是另造“殀”以示区别,所以“殀”是后起字,不可用来比较,《集韵》:“殀,少殁也。”(3)噫,《广韵》之韵“恨声”,怪韵“噫气”,实际上都是名词。(4)鞞,《说文》“佩刀丝也”,包氏注引《庄子》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汉魏以前文献鲜有使用者。同源词的比较首先必须是语音语义有共同点,然后才谈得上“比较”。如果语义的比较不能落到实处,那语音的构拟就成了飘浮之物。

第二,退一步说,就算上述汉语四组词有包拟古所认为的词义,但汉藏语双方都有大量的同义词。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藏文“倒、跌”意义的 gyel/sgyel,其对应的汉语词就是“夭、殀”,为什么不是“跌、倒、蹶”等?又藏缅语族中表示跌倒的词还有 figril(藏语)、ka³¹to³³(景颇语)、lai(缅甸语)、lən(阿昌语)、lan³⁵(浪速语)、bo⁵⁵(怒苏语)、xa³¹lol⁵⁵(格曼僜语)、get(博嘎尔珞巴语)等(吴安其 2002)¹。何以不考虑这些因素?

何九盈先生在谈到“亲属”语言比较时指出:“人类的音节结构、语音形式总是有限的,而各语言的词汇是极为丰富的。以丰富的词汇与有限的音节相对比,即使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语言,要找出词汇上的对应关系,这并不困难,因为语音形式少则相同之处必然多。所以必须要调查研究乃至制定**严格的对比规则**,而且对用来进行对比的语言的发展历史、分化过程作出必要的多方面的(考古学、人类学等)论证。”²所言切中肯綮,“严格的对比规则”和“历史论证”,才是比较构拟的基础,否则,一切都是飘浮之物和影响之说。

三 古音构拟必须符合汉语事实

通观包拟古等人的古音构拟,完全是从藏缅语出发,于汉语事实全然不顾。本文不能一一批驳之,仅能以影母拟音说之。按照包拟古的说法,原始汉藏语的*sk-音型发展为中古的精组齿音系列和喉音系列,影母字即在其中。其曰:“我跟李方桂一样都倾向于*sk-变为中古汉语的s-。实际上,历史比较法的证据非常有力地说明藏语中的sg-跟sk-都对应于中古汉语的? (按即影母的拟音)。”(74页)然而验证之下,其“证据”根本就不能成立。上一节影母字的构拟就是如此。让人很难相信,上古时期,“桃之夭夭”之夭,其语音会有如此复杂? sgr-/skr-,三辅音连缀,古人如何吟唱?它本来是一首很欢快的民歌——送嫁诗,音节如此复杂,怎么能够表达那种欢乐的气氛?要知道,《诗经》是汉民族诗歌作品,它句式整齐,押韵方式与其他民族的诗歌作品不一样。

一般认为,《切韵》中的影母字是零声母字,周秦时代也应该有零声母的字,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以元音开头的音节,即使是现代藏缅语也有声首为元音的词语,如羌语中纳木义语 a⁵⁵po³³(哥哥)、ε⁵⁵ne⁵⁵(母亲)、尔苏语 a⁵⁵me⁵⁵(什么)、道孚语 atchə(什么)。³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所附词汇表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词语,在俞敏先生等研究梵汉对译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梵文中很多元音开头的音节词,如汉魏时期的梵汉对音词:

1 以上参见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138、171、134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何九盈《所谓“亲属”语言的词汇比较问题》,《音史新论》第34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

3 以上羌语的例子取自《汉藏语概论》第271、289页。

aranya(汉译“阿兰若”)、arhan(汉译“阿罗汉”)、indra(汉译“因陀罗”)等。¹这些都是显然的语言事实,汉语难道就没有这样的音节?在秦汉时期历史文献中,一些汉语对音词都是零声母字,如《汉书》中“安息”对音 *arsak*,“乌桓”对音 *avars*,“安蔡”对音 *aorsi*,“焉耆”对音 *argi*,²这些都是影母字对译元音起首的音节。这些对音都是两千年前的,其可信度远胜于今天的藏语。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等著作坚持影母的上古音为零声母,是符合汉语历史语音的。郑张批评王力影母构拟是“混淆清浊之大界”,³谬甚!声母有清浊,元音岂有清浊之对立(影母以元音开头)?至于郑张和潘悟云将影母改为小舌音 *q-*,⁴同样是脱离汉语事实,于包拟古也是一百步之笑。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零声母的影母字在发音时,可能会伴有某种类似喉塞音 *ʔ*-的带音状态,但这属于发声问题,不是音系问题,否则,在对音中就不能出现整齐一律的影母字对音非汉语元音起首音节字的情况(不能以极少数“不确定”的对音例子而否定其规律性)。

再看潘悟云的研究。潘氏为了说明精系字“子”的上古音形态,用来比较的词语不惜拐弯抹角(潘悟云 2000, 307 页)。

“子”**splũ*,与“李”**b.lu*谐声,同根词有“育”**lũk*,“胞”**pru*。可比较藏文的 *phru*(子宫)、*rog*(胞衣)、*bu*(儿子),白土壮语的 *luuk*⁸(儿子) *buk*⁸(襁褓)、*rug*⁸(胞衣)。

先撇开语音对应不说,以上除了藏语和壮语的“儿子”与汉语“子”有意义上的一致外,其他“子宫”“胞衣”“襁褓”等都不能成立。“子宫”是子宫,⁵“胞衣”是胞衣,“儿子”是儿子。汉语的“子”不直接对藏语的“儿子”*bu*,却通过二等字“胞”*pru*来传递,如此“拐弯抹角”,实在有点滑稽。根据白保罗的研究,表示“儿子”或“孩子”的词根形式为 *za* 或 *tsa*,侄子(女)为 *tsha*,其书注释【86】有详细的解说(204 页)。这些词语的语音形式还恰好与汉语“子”相对应,可是却为了迁就其精系**spl-*的古音构拟,就不惜从藏语、壮语中找了些声母为 *p-*或 *r-*的词比附。这种比较构拟,用白一平(2005)的话说:破坏了“游戏规则”,颇有作弊之嫌。⁶

此外,据郑张《上古音系》提供的资料,儿子的语音形式还有 *sras*(98 页),可是它与潘氏“子”音**splũ*毕竟有点距离,所以不可取。而令人质疑的是,既然汉语与藏语、壮语同源,表示儿子(或子女)的三个词的语音相差如此巨大?藏语为 *bu*,壮语为 *luuk*⁸,汉语古音为 *splũ*,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似”而扯不到一起!

其次是语音对应,汉语“子”**splu*是三合辅音连缀的音节,所列举的藏文和壮语的词语中,除了藏文“子宫”是二合复辅音外,其他都是单声母词,且声母的发音部位也不

1 施向东《梵汉对音与古汉语的语流音变问题》,《音史寻幽》第13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参阅冯承钧《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和岑仲勉《汉书西域传校释》(中华书局1979年)等相关历史考证文字。按汉语对音规律,-*r*在音节末尾时,汉语一般以-n对译,处于音节之首时则以-l-对译。

3 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影母由*ʔ*改*o*,郑张《上古音系》转述后注曰:“按影母为全清,元音开首则属浊,此举混淆清浊之大界。不妥。”(第18页)此后郑张多次表述了这个观点。

4 潘说见于《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亦有论述。

5 据《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藏语 *phru gu* 是孩童的意思,而不是子宫。潘氏沿袭包拟古的错误。包氏为证明二等韵有-r介音,就以藏文 *phru-ma*(子宫)对应汉语的胞**pru/pau*(页246)。

6 白一平《亲缘性强于偶然性:古汉语与藏缅语的概率比较》,《汉语的祖先》第143—144页。

一致，或唇音 b-、p-，或流音 r-、l-，有的还有辅音韵尾，且元音也不一样。读者从这些亲属语言的比较中实在难以看出“子”的上古音是*splu。把这样一些在语音上毫不相干的词类聚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比较规则，何来之有！

至于音系构拟，其中问题就更加严重。

按照李方桂、包拟古等人的研究，《切韵》中的精系字上古音是来自带 s-冠音的复辅音结构，有所谓 st-、sk-、sp-型，如李方桂（1980）：造*skhəgw，修*stjəgw；潘悟云、郑张尚芳等认为还应该加有流音后缀，即 skl-或 skr-等，如潘悟云（2000）：接*sklep，蒜*sqlons，并进而推论庄组字也是 s-冠音词头：*skr->庄，*skhr->初，*sgr->崇，sr->山。然而，根据考古发掘和中外历史文献，中外对音词的精系字都是单辅音结构。例如 cina 一词，指称周时的秦国，已为学界所公认。此词屡见于梵文文献，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梵文《国事论》中。³可见“cina”当指秦穆公称霸西戎的“秦”（前 659—前 621）。又古代中国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文献中屡称“赛里斯”或“丝国”，实际上就是中国丝绸（丝）的音译，一般拼写作 seres（复数），英语、瑞典语、丹麦语、俄语等欧洲语表丝绸的 silk 即源于此（在词的拼写上略有不同）。英人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屡屡提及这个词，“丝国”拼写作 serike，丝织品则拼写作 seric。⁴又如上世纪初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材料有 kosava 一词（意为毛毯编织物），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书中的“氍毹”，也就是《尚书·禹贡》中的“渠搜”，《汉书·地理志》中的“渠叟”，为西域古国名，以生产皮毛物而获此国名，⁵尤如中国被欧洲人称为赛里斯一样。又有“师比”（匈奴人的金属带钩），或称“犀比”“胥紕”“鲜卑”等，这个词早见于《战国策》中，《史记》《汉书》等均有记载，它实际上就是匈奴语 serbi 的对音词，这个词伯希和和白鸟库吉等均有考证。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这些字皆为精庄系字，在对音上都是单辅音，且年代很早。比如《禹贡》，按照王国维对两周金文的考证，其成书应当在西周时期。⁷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前 800 年前后的周宣王时代，齿音系列 ts-、tsh-、dz-、s-等就已经存在，此后数千年来一直存在于汉语的各个历史阶段之中。如此看来，将精系字拟为 sk-之类的复辅音，于古无据，断断不可取。

四 用来比较的汉语词义必须是固有的

前面的讨论已涉及此类内容，下面再讨论梅祖麟的同源词比较。

梅氏在他那篇颇为自负的文章《汉藏语的“岁、越”“还（旋）、圜”及其相关问题》

1 我们还要指出潘先生拟音上的毛病：既然认为来母字为 r-，而“李”字却为*b.lu，按其体例应为*b.ru；依照谐声关系，则“子”也应该拟为*spru。其全书音系构拟中漏洞甚多，不胜枚举。

2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音系构拟中也有单辅音的精系字，s-词头的字主要限于那些跟非齿音谐声的一批字，而于 sp-型的复辅字则取存疑态度。参见该书 88—91 页。

3 饶宗颐《蜀布与 Cinapatta》，《梵学集》，第 23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按，此词的域外对音还可参阅下列文献：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1912 年《通报》），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编 36—48 页，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希腊语文献参见[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升译，中华书局 1987 年。

4 可参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二章等内容，向达译，中华书局 1935 年。

5 参见马雍《新疆佉卢文中 kosava 即氍毹考——兼论渠搜古地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112 页。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6 参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21 页，语文出版社 1989 年。

7 王国维《古史新证》，3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又新近发现的文物公孟铭文亦可印证，参见李零《论夔公孟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 年第 6 期。

(《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讨论了汉语“岁、越”与藏语的同源词关系。梅氏从“岁”字甲骨文作“戌”形出发(实际上只是形似而已),认为现在的“岁”从戌得声,与“越”为同源词,因为《释名》有“岁,越也”之说。因此汉语的“岁”**skwrjats*与藏文行走意义的*skyod-pa*为同源词。然而,细绎之下,梅氏之说根本就不能成立。

首先,“岁”作越过的意义并非本义,《释名》声训只是一种描写,并非该词的本义所在,这从全书训释体例中可以说明。如卷一《释天》:“日,实也,光明盛实也。月,缺也,满则缺也。年,进也,进而前也。岁,越也,越故限也。”如果我们认为“日”有“实”义,“月”有“缺”义,“年”有“进”义,岂不大错特错,对训诂学的无知!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包括甲骨文和金文,“岁”字从没有“越过”的意义,这是最能说明的问题。既然“岁”无此意义,就很难和“越”字扯在一起为“同源词”。其次,《释名》训释词之间的语音只是一种相近关系,如“日”与“实”“月”与“缺”“年”与“进”“岁”与“越”,声母完全不同,把这种声训方式看成语音的完全相同,也是对《释名》一书的极大误解。

再考察藏缅语族,在年岁意义上,藏文为*lo*,羌语*pə*,景颇语*niŋ*³³(《藏缅语语音和词汇》433页)。现在需要考察的是:在这些藏缅语中,表示年岁的词是否也有“行走”的意思?梅氏在文中以印欧语的年岁词为例,如英语的*year*和德语的*Jahr*,它们也是来自“行走”意思的词根(*to pass, to go*),以此说明:“这种语义的演变正和汉藏语中的语义相同。”然而,梅氏在文中根本就没有讨论藏缅语中的年岁词是否也有这种词义的演变。

在音系构拟上,梅氏一方面采用了李方桂的古音构拟,但另一方面又破坏其例。按照李方桂的理论,*r*介音只出现在二等韵和章组声母中,而“岁”“越”均为三等字,不应该有*r*-介音。但梅氏却有理由:(1)龚煌城证明喻母三等字为**gwrj-*,故“越”上古音为**gwrjat*;(2)既然“岁”“越”同源,故“岁”为**skwrjats*;(3)根据龚氏研究,喻三对应藏语词都是*gr-*的复辅音,如汉语“羽”**gwjagx*:藏*sgro*(翎翻),芋**gwjags*:藏*gro-ma*(甘薯):援**gwjans*:藏*grol*(解脱、解开),故喻三为**gwrj-*。

请注意梅氏论证实际上是一个循环论证,读者可以明白,无需解析;其次音系构拟上,前面说过,将精系构拟成*sk-*或*skr-*型,不管是谁家的构拟都是无稽之谈;再检阅龚煌城(1990)那篇文章,其说颇有问题。

龚氏在《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一文中,¹关于喻三与藏语的比较中实际上只列有六个词:“于(往)、芋、羽、友、胃、援”(原文没有“越”字),从这仅有的六个词的比较中就能说明喻三为**gwrj-*?令人怀疑。譬如汉魏时期的梵汉对音,喻三和匣母对音的都是*v-*,不存在对音*gr-*的情况。²汉魏距《诗经》古音时代很近,语音不可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况且“越南”一词现在还拼写作*Vietnam*,难道就没有一点历史语音的遗迹?且龚氏在藏语词的选择上也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为什么藏语*gr-*对应的都是喻母三等字呢?有无例外?至少在一点上作者没有交代清楚。无需从其他地方找出反例,文中材料即是,藏语以*gr-*开头的词语既对应喻母三等,又对应匣母二等,更多的是对应来母字,没有一个准的。平心而论,龚先生在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上造诣深厚,但在汉藏同源词的历史比较上却有点捉襟见肘。所作比较大多从假定的上古汉语语音系出发去

1 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3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参见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6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寻找同源词，而汉语上古音构拟又一切服从藏语，藏语是什么声母，汉语上古音就是什么声母，然后循环论证——整个研究的论证思路基本上如此。如该文先假定汉语“联连”古音为*gljan，然后从藏语找出 gral（行列、排、绳索）这样一个词，于是可以相互印证。但是在藏语中表示联系的词很多，如 fibrel（联系）、sdep（连接）等，我们看不出作者为什么要选择 gral 这样一个词的理由。与此相联系的是在词语的比对上择焉不精，如上文提及的汉语“羽”对应藏语的翎翮；“芋”对应藏语甘薯，“援”对应藏语“解脱、解开”，严格地说，这三组词语的比对都是有缺陷的，从语义上说，“羽”与“翎翮”是有差别的，“芋”与“甘薯”是两种植物，而“援”与“解脱”的语义就相差甚远。与其说藏语词 grol 对应汉语“援”，还不如说对应“解”，二等字，古音为*krigx（李方桂拟音），可惜又不能说明喻三问题。这种随心所欲的比较构拟，一旦捅破，不知还有多少人会相信。

在此，笔者还要指出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岁”与“戌”是两个不同的字形，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等所谓“岁戌古本一字”之说，很值得怀疑，且学界对此解释尚有分歧。¹作为斧钺的字在甲骨文中有“岁”“戌”“戌”“戌”等，它们形体虽然相似但不完全一样，点画出入还是很大。所言“岁”“戌”异体或“岁”从戌得声，均不可据信。不从语音出发，仅凭形体相似就以为古文字“岁”“戌”有异体或形声关系，照此类推，“岁”与“戌”“戌”之间或“戌”与“戌”之间，都有异体或形声关系，这种猜测令人怀疑。此问题复杂，容今后讨论。

五 余论

从上述四位学者的研究看，音系构拟与同源词的比较都存在严重缺陷。他们并没有从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和汉语事实出发，而是从亲属语言音系特征出发，预设古音条件，然后在所谓的亲属语言中寻找类义词，循环论证，同源词的比较实际上蜕变为同义词的随意挑选。正如郭锡良先生所指出的，存在严重的“音隔”“义隔”和“类隔”现象。²

就比较方法而言，梅耶在著作中反复提醒我们：“有规则的对应”和“语音对应的规律性”。例如，《切韵》音系中入声韵-p、-t、-k 三大韵类与阳声韵的对应非常整齐，上溯到《诗经》时代，三大入声韵的分开押韵也非常明显，可以说明它的系统性。如果再旁观藏缅语族，譬如以汉语收-k 尾的词族为参照，它是否也是如此呈现有规律性和系统性的语音演变？梅耶警告说：“研究一种古代语言或近代语言的词源学家，如果把所要解释的词都先验地看成原有的，就会常常陷入错误。”³

然而仅观一些学者的比较研究，大多是从自己虚拟的古音出发，缺乏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更缺乏汉藏语的“历史论证”。或时代太晚，不能说明“原始”问题；或各取所需，音系混乱，矛盾百出，乃至各家异词。对此，龚煌城先生亦有感慨：“翻开最近学者所提出的汉藏同源词，也仍会发现竟然是南辕北辙，彼此之间差异很大，而这正是阻碍汉藏语比较研究进步的最大阻力。”⁴ 可惜的是，龚先生身在庐山之中，或许并不明白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都导源于一种模糊而又不确定的认识观念——汉藏同源

1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2394—2406页。中华书局1996年。

2 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3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37页。岑麒祥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4 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